清史纂修

《出使条规》与蒲安臣使节团

尤淑君

一、前言

签订《天津条约》之前，清帝国只有派遣敕使的先例，没有平等往来的友邦。即便是康熙朝的图理琛使团、雍正朝的托时使团、德新使团赴俄国报聘之事，只被当作特例，甚至清政府对这些出使活动，讳莫高深，刻意抹去与俄国对等往来的官方记载。[①]可是，欧美各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外交惯例，强调各国平等的原则，[②]完全不同于“天下秩序”的等差原则，自然让清政府无法接受。因此，当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的“互派使节”[③]条款时，这使得清政府相当为难。如江西巡抚刘坤一以为，中国若遵行条约，遣使驻外，如同“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④]同治朝派遣使团之举，虽然只是考察性质，并不是正式的驻外使节，但总理衙门却试图援用“交聘”的概念，[⑤]希望透过斌椿使节团、蒲安臣使节团的出访，让派遣使节之举，如同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报聘”，间接承认中外双方对等的事实。

清政府派员赴外考察，始于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派遣斌椿（汉军正白旗人）等人游历欧洲的行动。这次非正式的游历行动，最后促成清政府做出遣使出访决定，并由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充任中国特使，携总署章京志刚（满洲镶蓝旗）、孙家穀（咸丰六年进士）等人，历访欧美各国。[⑥]过去学界对斌椿使节团与蒲安臣使节团的评价呈两极，多认为蒲安臣使节团成绩斐然，为中国争得利权，而斌椿使节团却未能像蒲安臣使节团那么成功，只是走马看花，徒费公帑。如芮玛丽以为，斌椿使节团让英国政府抱着莫大的期待，却无益于中外关系的促进。蒲安臣使节团虽得到了欧美各国广泛的赞扬，但厌恶蒲安臣提出的亲华原则，使蒲安臣使节团未能达到预期目标。[⑦]或如王开玺以为，蒲安臣使节团虽在中西礼仪上带有屈辱色彩，但让东西方走到了一起，有助于中国近代驻外使节制度的建立。[⑧]何伟亚指出，威妥玛等人欲透过觐见礼问题，让总理衙门接受欧洲外交的惯例。出于同样的目的，威妥玛也引领着郭嵩焘使节团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并透过鞠躬礼的行礼，让大清皇帝降位为一个普通的东方君主。[⑨]

若比较使团访外的具体成果，斌椿使节团确实不如蒲安臣使节团表现亮眼，但这些成果都是用后人的角度去评价，未必能呈现当时人的想法。事实上，对当时的清朝官员来说，斌椿使节团的成果就是没有成果，而蒲安臣使节团的成果却不被清政府所喜。对清政府来说，出使访外实为不得已之举，否则无法让外国公使认同清政府有履行条约的诚意。一旦遣使访外，必然会遇到中国使节如何向欧美各国元首行礼的问题。中国使节绝对不能向欧美各国元首行跪拜礼，只能按西方礼仪行鞠躬礼，届时

[收稿日期] 2012－11－10
[作者简介] 尤淑君（1979—），女，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杭州 310028

外国公使势将要求比照办理，同样以鞠躬礼向皇帝行礼。总理衙门不愿让中国使团的觐见礼仪，成为各国公使团不行跪拜礼的理由。为了避开敏感的觐见礼问题，总理衙门将斌椿使节团定位为非正式的考察团性质，并指示斌椿等人觐见外国元首时，只能立谈，绝对不可行鞠躬礼。对蒲安臣使节团，总理衙门制订《出使条规》，要求蒲安臣照章办事。然而，蒲安臣虽为中国争得在美华工的权益，却违反了《出使条规》，甚至还带着中国官员，向欧美各国元首行鞠躬礼，成为各国驻华公使团主张鞠躬礼方案的依据，让总理衙门失去与公使团讨价还价的空间，在觐见礼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二、斌椿使节团的西礼体验

长久以来，英国一直想与清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希望清政府接受欧美国家惯行的“国际法”，纳入国际社会的行列。[⑩]例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局外旁观论》，[⑪]或英国参赞威妥玛《新议略论》，[⑫]皆建议清政府尽快改变与外国往来的形式，并遣使出国，与欧美各国互通声气，增进中外双方的友谊，否则欧美各国将视中国为国际事务的局外者，自然不会依照国际法，友善对待中国。威妥玛指出：

> 盖泰西诸国，素以相派大臣为尽来往之礼，亦同礼者，联为局中；不同礼者，视为局外。中华果愿一体互派，其益有二：如今中国独立，不与邻邦相交，各国未免心寒，能与相通，庶可易寒为热。[⑬]

当总理衙门将赫德等人的建议，发交各省督抚讨论时，大多数督抚虽赞同改革，但不愿参照西法，坚持从传统中寻求先例，并建议先派人考察外国国情，再评估清政府遣使驻外的可行性。[⑭]

同治四年（1865）九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欲回国完婚，向总理衙门请假，并提议可顺道带中国官员与同文馆学生前往欧洲，游历各国。[⑮]于是总理衙门决定派遣总署章京出国见识，收集外国情报。不料，总署章京多是进士出身，自矜身分，竟无人愿意前往。经赫德的推荐，恭亲王等人选定在赫德手下工作的斌椿，[⑯]率领四名随员，组成一非正式的使节团。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1866 年 2 月 20 日），总理衙门奏准赏斌椿三品衔，率领同文馆八品官凤仪、张德彝（原名德明，汉军镶黄旗）、笔帖式广英（汉军正黄旗）及同文馆学生彦慧，赴欧洲游历，[⑰]命令他们详记沿途见闻，供总理衙门参考。[⑱]

斌椿使节团抵达欧陆后，便与赫德分开行动，自行前往欧洲各国访问。赫德虽未同行，但负责在幕后筹划，并借各国驻京公使之力，与各国政府接洽妥当，让斌椿一行人顺利完成任务。[⑲]抵达英国后，斌椿连日拜会各国驻英公使，并获邀请，参与韦尔斯亲王主持的宫廷舞会，[⑳]可见赫德事先已有安排，斌椿一行人方能顺利受邀。斌椿的《乘槎笔记》未记述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细节，但可根据使团随员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了解斌椿等人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情况。张德彝指出：

> 申刻，君主邀入正宫……下车入正门……后由包腊引入内门，见君主着青衣，服长裙，年逾四旬，风姿不减……君主立，明等（张德彝等人）亦立。问斌大臣云：来此远路，尚安妥否？在本国曾住几日？并言：两国从此和好，自应永息干戈等语。[㉑]

值得注意的是，斌椿觐见英国女王时，并未用鞠躬礼，亦未以跪拜礼觐见，仅是立谈而已。[㉒]不过，斌椿虽未向英国女王行鞠躬礼，但从张德彝的记载：“明等见英国大臣召对时，鞠躬免冠，握君主之手而嗅之，是为敬君”，[㉓]可知斌椿等人看过英国官员向女王行鞠躬礼的情形。可以说，这次觐见英国女王的经验，是中国使节见识西礼的初体验。

随后出访欧洲各国时，斌椿等人又陆续拜会各国外交部，并获得荷兰总理、丹麦总理、瑞典国王、俄国大臣、普鲁士国后、比利时国王的接见，同样是立谈，但不脱帽，以示区别。

> （瑞典国王）其君臣相见，无山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明等相见亦如之，只不脱帽。[㉔]

> （比利时国王）俄而大臣四员迎入内庭，谒见其王……时王后、王弟并四五女臣，皆侍于侧，与明等立谈。[25]

斌椿使节团只用一年，便将与清政府缔约的10个国家，全数“报聘”。斌椿使节团的性质虽似游历，但作为清政府官方首次访问欧洲各国的初体验，在督抚廷议时，遂多被援引为例，意义可谓重大。[26]

斌椿使节团回国前，各省督抚大多反对遣使外国之事。例如，浙江巡抚马新贻认为，英人要求中国派官驻外，根本心怀鬼胎，企图提高各国驻京公使的地位，逐步把持中国国政。[27]同治六年，总理衙门奏请各省督抚各抒己见，讨论请觐皇帝、遣使互驻、设置虬极线、铺设铁路等问题。[28]对遣使驻外之问题，总理衙门指出过去政府不派使驻外的考虑，乃因清政府没有赴外国应办之事，而且中外礼节不同，语言文字尚未通晓，很难与外国政府沟通。由此可见，清政府不愿遣使的主因，是不清楚外国情形，担心若冒然遣使，中国使节可能被外国政府狎侮，贻羞域外，甚至可能像中行说（汉文帝派往匈奴出使和亲的宦官）卖国求荣。[29]但斌椿使节团的出访报告，令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改变态度。如陕甘总督左宗棠便引用斌椿出访为例，指出遣使出国可打探欧美各国的情况，遏阻各国驻京公使的专横。[30]署湖广总督李瀚章认为，欧美各国既为敌体，自然可行“交聘”，赞同清政府遣使，赴欧美各国聘问，查探外国虚实，与外国政府直接交涉。[31]换言之，斌椿出访之举，让清政府意识到遣使出洋已是必行之事，不如化被动为主动，借遣使出国，了解欧美各国的政俗人情。如此，总理衙门就能根据这些情报，因国制宜，决定外交政策的方向，并可直通各国政府，避免公使转述的口误，减轻各国驻京公使片面施压中国的压力。

三、觐见礼问题与《出使条规》的限制

适逢美国公使蒲安臣任满返国，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文祥等向蒲安臣提出请求，希望蒲安臣充当中国特使，代为出使欧美各国。[32]从奕䜣与蒲安臣的对话，可知奕䜣相当欣赏蒲安臣，蒲安臣也愿意协助清政府走向世界，[33]遂接受总理衙门的委托，同意以“中国特使”的名义，率领中国官员访问欧美各国。[34]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1867 年 11 月 18 日），清政府授命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使臣”，[35]并颁给木质汉、洋文合璧的关防，以资取信外国。

为了节制蒲安臣的行动，伴随蒲安臣出使的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志刚及总理衙门章京孙家穀均加二品顶戴，授予“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36]与蒲安臣的名位相等，亦发给木质满、汉文合璧的关防，可随时奏事，确保机密。[37]同时，为了保持列强势力平衡，不得罪英国和法国，总理衙门再度聘请曾随同斌椿使节团的英国驻京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 Brown）、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E. de Champs），[38]分任使节团的左协理、右协理，并带去三十多名中国随员、翻译、同文馆学生。

“使才难求”看似是清政府无法遣使的原因，但让清政府迟疑不决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中国使节团如何觐见外国君主的问题。对清政府而言，这个问题实与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互为表里。由于总理衙门尚未制订“外国公使觐见礼”，也没有历史先例可供遵行，中国使节团如何觐见外国君主的问题，同样会影响“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制订。若中国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外国君主，中国将失国体；若中国专使以鞠躬礼觐见外国君主，将遭各国驻京公使援引为用，比照办理，到时清政府无法再坚持跪拜礼。换言之，清政府若遣使驻外，虽能改善与欧美各国的关系，却让觐见礼问题无法解套，势将同意外使行鞠躬礼的要求。

为了解决“遣使”与“请觐”互相冲突的难题，总理衙门才会请托蒲安臣担任特使，让清政府收到遣使出洋的实际利益。[39]正因为蒲安臣是美国人，总理衙门只要以“客卿”之名，任命为中国特使，这样蒲安臣代表中国、面见各国元首时，自然依循欧美各国通用的鞠躬礼，各国元首也不会要求蒲安臣行跪拜

礼，折辱中国的体面。是故，总理衙门任命蒲安臣之举，不但解决“使才难求”的问题，也回避中西礼仪不同的矛盾，“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40]不过，总理衙门对蒲安臣使节团的规划，仅视为试办，只给一年时间，故不是常驻各国的驻外公使。一旦各国公使要求比照蒲安臣使节团，以鞠躬礼觐见皇帝，总理衙门仍有遁词，可向各国公使解释蒲安臣使节团只是特例，不是正式的中国公使，即可予以拒绝。

为了防范蒲安臣与外国勾结，出卖中国利权，清政府依照《中英天津条约》，[41]颁发《出使条规八条》（简称《出使条规》），[42]要求：蒲安臣必须训练中国随行人员；遇有碍国体之处，蒲安臣可行礼如仪，但中国官员概免行礼，或回避不见；遇有要事，蒲安臣不可擅自决定，必须请示总理衙门，再行决议。[43]不过，即使有《出使条规》，总理衙门对蒲安臣也不放心，特授与志刚、孙家毂上奏权，暗中节制蒲安臣，避免蒲安臣与外国私订条约。[44]同时，总理衙门考虑各国公使可能又提起“亲递国书”的要求，故命令蒲安臣不需亲自呈递中国国书，只须将国书交由各国外交部官员代递，就算完结，并事先向各国驻京公使声明，各国若有国书，可交由蒲安臣转递，或寄给该国驻京公使转呈总理衙门，避免各国公使又重提“亲递国书”之事。[45]

为了安定国内舆情，总理衙门再针对觐见礼问题，要求蒲安臣注意中西礼仪的差异，尽量不要让中国使员面见外国元首或官员，避免行礼不同的尴尬。若中外官员不期而遇，总理衙门也要求蒲安臣代为解释，让中外双方皆免行礼，等“外国公使觐见礼”的方案议定后，再比照办理。此外，总理衙门也说明，蒲安臣无须推辞各国优待使节的待遇，但必须向欧美各国声明，蒲安臣的出使礼节，只是特例，并重申西式礼仪与中国体制不同，中国不会援照办理，中国国体也绝不更改。[46]从两宫皇太后召见志刚、孙家毂的过程，可知清政府非常在意中国官员以何种礼仪，面见外国元首。

> （皇太后）问：到外国见其君主不见？
>
> （志刚）奏对：见与不见，在各国君主，但奴才等断不先自求见。[47]

换言之，从中国国书不亲递、不令中国官员面见外国元首、中外双方皆免行礼等事，可知总理衙门制订《出使条规》的原则，是尽量让蒲安臣使节团遵守“宾礼”的规制，不逸出清政府可接受的范围。

四、蒲安臣使节团的礼仪表现

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欧美各国虽不反对非派遣国国籍者充任使节，但通常不接受本国人作为第三国派往本国的使节。[48]为了支持清政府遣使出国之举，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同意蒲安臣担任中国特使，并希望得到蒲安臣的帮助，处理《中美天津条约》的修约事宜，解决美国急需华工的问题。[49]由于西华德的协助，蒲安臣使节团得以前往白宫，面见美国总统约翰逊。但蒲安臣、志刚等人却违反了《出使条规》回避面见和亲递国书的规定，不但向美国总统行三鞠躬礼，还由蒲安臣向美国总统，呈递中国国书。对蒲安臣等人，美国总统一一握手回礼，还同意同治皇帝亲政后，再议“外国公使觐见礼”问题，让志刚等人相当高兴。[50]随后，按照欧美各国的外交惯例，蒲安臣也带着志刚等人逐一拜会美国政府外交部首长和各国驻美公使，并参加美国政府举行的招待会，表示友好之意。[51]

使节团旅美期间，蒲安臣以“世界大使”之姿，四处演说，在美国各地引起轰动。[52]后来，蒲安臣与新上任的国务卿华尔特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再由总理衙门批准生效，一举解决修约和华工问题。[53]蒲安臣虽违反了总理衙门的限制，自行与美国政府重新议约，但《蒲安臣条约》无疑是中国首次与欧美国家签订平等条约的产物，并获得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减缓英国藉修约为由，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的危机。[54]

蒲安臣使团到达英国伦敦后，却因“扬州教案”的发生，[55]遭到英国朝野对蒲安臣使

团的冷遇。[56]当时英国朝野激愤，军舰已到南京示威，甚至英国媒体批评英国驻京公使普鲁斯的“合作政策”未获实效，要求英国政府出兵惩戒。[57]正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蒲安臣使节团直到10月1日（抵达伦敦的12天后），方得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史坦利。又等了一个多月，蒲安臣等人才得见维多利亚女王，可见英国政府对蒲安臣使节团的冷淡态度。11月20日（同治七年十月初七日），在温莎城堡（伦敦以西32公里），英国外交大臣史坦利带领蒲安臣使节团，谒见了维多利亚女王。面见女王时，蒲安臣、志刚等人皆向女王行三鞠躬礼，再由蒲安臣亲递中国国书，转达亲善之意。[58]

访英期间，蒲安臣使节团作了很大的努力。蒲安臣先向总理衙门报告英国女王接见过程，再说明美国仍维持“合作政策”，并建议总理衙门应据条约力争，尽量约束中国官民，才能不受外人挟制。[59]同时，蒲安臣向英国政府重提“合作政策”，并随时向英国官绅解释教案缘由，保证清政府将尽快解决“扬州教案”，希望英国政府能节制英国驻华公使或领事的权限，不要随意干涉中国内政。[60]由于蒲安臣使团的努力，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利兰顿爵士不再追究“扬州教案”，并发表声明，尊重中国自主之权，采取“修约缓进”的政策，命令英国驻京公使及领事们应配合总理衙门，不得随意调动军舰，制造不必要的外交冲突。[61]可以说，通过蒲安臣使团的交涉，英国政府又重回“合作政策”的路线，愿意尊重中国主权和司法权。中英关系的这一改善让清政府体会到遣使出访的好处，“实西国通行之公法，即可执此以平洋人之心矣”，“庶不挠于局外，而可捍灾患于无形矣”。[62]

抵达巴黎后，蒲安臣使节团同样遭到法国政府的刁难。法国外交部屡次诘问中国皇帝不接见公使、亲接国书的原因，让蒲安臣等人难以解释。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受蒲安臣使节团入宫觐见时，刻意减去军事仪仗，不让法兵在路旁列队欢迎，刻意降低接待规格。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869年1月24日），拿破仑三世在罗浮宫接见蒲安臣使节团，亲接中国国书。从志刚的记载，可知使节团觐见法皇的接待规格、行礼方式，及呈递国书后，使节如何退出皇宫。

> 是日，有陪伴官三员，乘官车御军至寓，接至其宫门下车，至其朝会之所，有司礼官俟，传知礼节。再进，为朝见各国使臣之所。届时传进。正面设两位，阶三级，旁列卫士，国军立于三级下。司礼官胪传带见。使臣依次三进步，每步一鞠躬。协理恭赍国书，立于三使臣后……语毕，协理将国书恭交使者传于蒲使，亲递于法君，那波仑第三亲接。礼毕，退三步，每步一鞠躬而出。复由司礼官带至君后处，进退如前。仪礼毕，由陪伴官乘原车送归寓馆。[63]

由此可知，法国官员先至旅馆迎接蒲安臣等人，马车行至罗浮宫门下车。蒲安臣等人入殿后，依次行三鞠躬礼，再递交中国国书，由拿破仑三世亲接国书，问候中国皇帝。最后蒲安臣等人再行三鞠躬礼，退出宫殿，由法国官员送归旅馆。值得注意的是，与拿破仑三世会见时，蒲安臣趁机提出“合作政策”。拿破仑三世虽不赞同，但因英国政府已表明“对华合作”的态度，只好敷衍蒲安臣，一直不给肯定的答复。[64]法国政府不愿发表与中国合作的声明，也没有签订具体的协议，反而让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自带兵船，向中国催办教案，明显不愿配合英国“对华合作”的政策。[65]蒲安臣等人一无所获，只好转往瑞典等国。

访问瑞典、丹麦、荷兰后，蒲安臣使团转往柏林，在普鲁士滞留40多日，才前往俄国。[66]蒲安臣使节团一抵达柏林后，很快就获得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接见。比起法皇拿破仑三世，普王威廉一世更礼遇蒲安臣使节团。例如，迎接蒲安臣使节团入宫时，沿途列军兵，安排仪仗，实优于法国的接待规格。威廉一世亲接国书后，与王后立送使团出宫，[67]并八次约见使团人员，或赐席宴饮，或赠票观剧，或茶叙参观，可见普鲁士结好中国的意图。[68]蒲安臣也拜访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希望欧美各国能支持清政府，协助改革。当时俾斯麦正准备出兵法国，无暇东顾，当然愿意向清

政府表示善意，故声明普鲁士完全尊重中国自主，愿协助中国步向富强。[69]显然，普鲁士优待蒲安臣使团的结果，让志刚等人推崇备至，以为普鲁士是对华亲善之国，可协助中国进行改革。[70]

离开柏林后，蒲安臣使节团转往俄国圣彼得堡。一到俄境，蒲安臣便忙着拜访俄国外交大臣库尔查科夫，进行会谈。[71]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1870 年 2 月 27 日），蒲安臣使节团面见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同样行鞠躬礼，呈递国书。[72]俄国沙皇亲接国书，设宴饮馔，却大谈美俄亲善，完全不回答中俄领土纠纷、陆路通商、新疆变乱等问题。[73]俄皇的敷衍态度，让蒲安臣大为尴尬，十分焦虑，竟一病不起，逝于俄国。蒲安臣病故的消息，引起许多国家的注意，纷纷表示哀悼。[74]为了酬庸蒲安臣的效力，清政府特旨加恩，赏给蒲安臣一品衔，又颁发恤银一万两，交给蒲安臣的遗孀，[75]并命令志刚改任团长，督同协理柏卓安、德善继续出访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最后，使团完成出使 11 个国家的任务，于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1870 年 11 月 18 日）抵达北京。[76]

五、余论：蒲安臣使节团的影响

当志刚率领的使节团访问比利时、意大利及西班牙时，仍未遵照总理衙门的《出使条规》，同样向这些国家的国王行鞠躬礼致敬，亲递国书。[77]值得注意的是，志刚等人行鞠躬礼的动机究竟为何？如果是蒲安臣授命志刚等人违反《出使条规》，强迫他们行鞠躬礼、亲递国书等事，那蒲安臣去世后，志刚自然可改弦易辙，遵照总理衙门《出使条规》的指示。但为什么志刚却不这样做？从志刚与外国访客的问答中，可窥见志刚的想法。志刚以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在中国的地理位置，而是中国以礼立国，行中庸之道。因此，志刚强调《礼记》：“礼从宜，使从俗”，[78]以为使者应入境随俗，因地制宜，即持中庸之道，方符合中国礼法的原则。[79]

> 前在西国，客问使者（志刚）曰：“地球上无之而非国也，中国之说何谓也?”使者晓之曰：“……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致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非若印度之佛言空，犹太之耶稣言爱，波斯之拜火，麻哈摩之清真，日本之新德，此大地上之彰明较著者……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字矣”。[80]

由此可见，志刚等人不遵《出使条规》的原因，是依据《礼记》，以为礼宜从俗，使者可因地制宜，对外国君主行鞠躬礼。以《礼记》“礼从宜，使从俗”之论，模糊中西礼仪间存在的礼制问题。

总理衙门并不了解蒲安臣的外交理念，无法从旁协助，就连同行出使的孙家榖也无法理解，颇有微词，[81]竟以为蒲安臣欣羡巴黎的繁华，才会滞留巴黎，延误行程。由此可知，同行的中国使员不一定能理解蒲安臣的做法，也很难让这些使员认识到“使节外交”的真意。对蒲安臣使节团的成果，各界褒贬不一。例如，马士以为，蒲安臣使节团的出使，虽帮助清政府对外交涉的发展，但并未真正令中国人改变自己的封闭观念，故批评蒲安臣白费功夫，失败收场。[82]但大多数学者仍赞赏蒲安臣“对华合作”的理念，[83]以为蒲安臣使节团的出使，多少影响了美国、英国的态度，有助清政府解决因修约、教案、觐事引起的外交冲突。[84]

姑且不论西方学者如何评价蒲安臣使节团，但蒲安臣使节团的出使，确实对中国传统对外交涉体制，造成了某种影响，分析如下。第一，总理衙门虽得到美国、英国“对华合作”的保证，但因蒲安臣没有遵守《出使条规》，让志刚、孙家榖等人以鞠躬礼面见各国元首，也向各国元首亲递国书，这使得“公使请觐”之事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志刚等人返国之前，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已以蒲安臣未言明“中国无报施之礼”为由，要求总理衙门比照蒲安臣面见英国女王的方式，制订“外国公使觐见礼”的相关仪节。[85]阿礼国也威

胁总理衙门若再不同意“公使请觐”，就表示清政府不愿“以客礼相待”，将不排除以武力强迫的可能性：

> 前年蒲大臣出使时，贵衙门既有咨会，应一律照会各国钦差大臣。蒲大臣到各国时，亦应豫为言明。乃蒲大臣并未宣之于口，蒲大臣在外国行觐见之仪，未言中国无报施之礼。如此大事，中国本系理所应为，自无俟外国相强。各国出境大臣，阻其入觐，即为不以客礼相待。[86]

面对英使阿礼国的质疑，总理衙门无法辩驳，只能以同治皇帝尚未亲政为由，敷衍阿礼国，暂时拖延请觐之事。[87]

第二，经过斌椿使节团与蒲安臣使节团的尝试后，清政府官员的态度明显转变。对遣使出国之事，多数督抚不再反对，多持赞同意见，以为遣使有益于中国，可压抑各国公使的气焰。大多数督抚虽赞同遣使，但仍有人持反对意见，如马新贻以为，“遣使驻外”之事只是洋人干涉内政的借口，清政府不应自堕陷阱。若有交涉之事，可仿照斌椿使节团之例，有事再出使外国。[88]因此，总理衙门囿于各种困难（担心外人挟制、外语人才不足、经费不足等问题），始终没有再派正式的使节，落实“遣使驻外”之事。直到光绪元年(1875)，发生“马嘉理案”，清政府迫于英使威妥玛的压力，[89]才任命郭嵩焘组成使节团，赴英国道歉，并趁势留驻英国，堵住言官的悠悠之口，成为清政府遣使驻外的首例。[90]

---

①李齐芳：《中俄关系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第126—137页。

②鲁毅、黄金祺：《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7—69、75—77页。

③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1《中英天津条约》，第198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华书局，2008年，卷41，号1441，第1723页，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刘坤一奏议覆奕䜣等英国呈递议论折。

⑤《清史稿》，卷212《交聘年表一》，中华书局，1998年，第8781页。

⑥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481页。

⑦芮玛丽著，房德邻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46—348页。

⑧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475、481页。

⑨⑩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0、159—161、165—166页；第159—161页。

⑪《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号1404，第1666—1673页，同治五年二月十六日总税务司赫德局外旁观折。赫德：《赫德日记（1863—1866)》，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第424页。

⑫⑬《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号1407，第1674—1683页；第1679页。

⑭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142—149页。

⑮赫德：《赫德日记》，第404页，1865年9月7日；第418页，1865年10月13日；第434—435页，1865年12月22日。

⑯赫德：《赫德日记》，第434—435页，1865年12月22日；第443页，1866年1月28日；第446页，1866年2月4日、1866年2月20日。

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号1372，第1621—1622页，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奕䜣等奏派同文馆学生三名随赫德前往英国游览折。赫德：《赫德日记》，第447页，1866年3月2日。

⑱斌椿：《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08年，第91页，同治五年正月初八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号1630，第1958—1959页，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奕䜣等奏斌椿等出洋游历现已回京撰有日记钞录呈览折。

⑲斌椿：《乘槎笔记》，第110页，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第112页，同治五年四月初五日；第114页，同治五年四月十五日；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

⑳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524—525页，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斌椿：《乘槎笔记》，第116—117页，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㉑㉓㉔㉕张德彝：《航海述奇》，第526页；第526页；第546页；第568页。

㉒斌椿：《乘槎笔记》，第 117 页，同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53—254 页。斌椿觐见英王“入门数重，至内宫。君王向门立，予入门侧立称谢”，再对照张德彝《航海述奇》记事，可知斌椿未行鞠躬礼。

㉖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卷 2，第 205—206 页。马士批评斌椿使团的结果是失败的。但笔者认为，斌椿使节团的意义在于中国尝试以旧体制加入国际社会，并谋求传统宾礼与西式礼仪的接合，而不是改变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

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5，号 1603，第 1925 页。

㉘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0，号 1767，第 2119—2121 页；号 1770，第 2125 页。

㉚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1，号 1794，第 2154 页；号 1796，第 2159—2160 页。

㉛《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2，号 1821，第 2191—2192 页。

㉜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第 254 页。

㉝《美国外交文件》，1865 年，第 447 页，转引卿汝楫：《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1956 年，卷 2，第 74—75 页。

㉞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第 254—255 页；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2，第 206 页。

㊱志刚：《初使泰西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卷 1，第 249 页，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㊲方浚师：《退一步斋文集》，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96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卷 4，第 20—21 页。

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 册，号 91，第 129—130 页，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特派美国蒲大臣本衙门志孙二大臣为钦差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

㊴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第 255 页。

㊵㊹《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1，号 1796，第 2160 页；第 2159—2160 页。

㊶《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 年，卷 28，号 1076，第 1023 页，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英天津条约。

㊷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85 年，第 459—461 页。

㊸《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2，号 1800，第 2167—2168 页，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给蒲安臣出使条规八条。

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4，号 1843，第 2248—2249 页，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奕䜣等奏咨会蒲安臣递国书二事折。此办法为总理衙门比照英国、比利时公使不亲递国书，只录出国书原文、送阅总理衙门的办法。

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4，号 1844，第 2249 页，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蒲安臣咨会。

㊼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1，第 250 页，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㊽鲁毅、黄金祺：《外交学概论》，第 103 页。

㊾Tyler 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Barnes & Noble，1922，p. 379.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67—468 页；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1，第 269 页，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三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9，号 2214，第 2791 页，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使臣志刚孙家穀折。

㊿51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1，第 269 页；第 270 页。

52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 673 页，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62 页。

5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 3 册，号 153，第 218—219 页，同治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中美议定于美京都订期换约；号 184，第 259—260 页，同治八年十月十九日关于互换美中续立条约照会；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1，第 271—275 页，同治七年五月初九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9，号 2212，第 2789—2790 页，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奕䜣等奏蒲安臣等在美续订条约请派员互换折。虽有条约保护华工权益，但美国各界仍歧视华人，甚至禁止华人移民。刘华：《华侨国籍问题与中国国籍立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7、41—46 页。

54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69—474 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3，号 2042，第 2521 页，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使阿礼国节略；卷 68，号 2184，第 2749 页，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英使阿礼国节略；号 2185，第 2750 页，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英大臣给蒲安臣照会。

55 56 82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2，第 248—250 页；第 215 页；第 218 页。

⑤⑦⑤⑨⑥③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2，第 299—300 页；第 300—302 页；第 308—309 页。

⑤⑧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第 714 页，同治七年十月初七日。

⑥⓪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58、470—471、478—481 页。

⑥①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2，第 302—304 页，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日；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2，第 215—216 页。

⑥②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2，第 305 页，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初使泰西记》日期有误，见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79 页注 49 之考证。

⑥④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2 年，第 292—293 页。

⑥⑤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81—482 页；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2，第 257—258 页。

⑥⑥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3，第 325 页，同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前往瑞典）；第 325 页，八月十七日（路过比利时）；第 326 页，八月十九日（抵丹麦）；第 326 页，八月二十一日（抵瑞典）；第 326 页，八月二十六日（抵荷兰）；第 330 页，十月十五日（转往普鲁士）；第 331 页，十月十七日（抵达柏林）。

⑥⑦⑥⑨⑦⓪⑦①⑦②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3，第 331 页；第 336 页；第 335—336 页；第 337 页；第 337 页。

⑥⑧孙家榖：《使西书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 382 页；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3，第 332 页，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初六日、十六日、二十二日。

⑦③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 2，第 217 页；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3，第 339 页，同治九年正月十八日。

⑦④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3，第 346 页，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 347 页，同治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第 352—353 页，同治九年四月初七日。

⑦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72，号 2306，第 2900—2901 页，同治九年四月初十日奕䜣等奏美使蒲安臣病故现筹办情形折；《中美往来照会集》，第 3 册，号 198，第 287—288 页，同治九年四月十八日对中国褒奖蒲大臣优恤其眷属事照覆致谢。

⑦⑥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4，第 379 页，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⑦⑦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4，第 352 页，同治九年四月初七日；第 358 页，同治九年五月十一日；第 364 页，同治九年七月初十日。

⑦⑧⑦⑨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2，第 310 页；第 290 页。

⑧⓪志刚：《初使泰西记》卷 4，第 376 页，同治九年九月十五日。

⑧①孙家榖：《使西书略》，第 381 页。

⑧③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65、470—476、481—486 页。

⑧④John Watson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0, p. 267;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388;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 Scribner's, 1912, pp. 254—271.

⑧⑤⑧⑥⑧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8，号 2187，第 2754 页；第 2757 页；第 2756 页。

⑧⑧《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号 1852，第 2270—2271 页，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马新贻奏议覆修约事宜折。

⑧⑨吴汝纶编：《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海南出版社，1997 年，卷 3《译威使送来洋文节略》，第 45 页 b，光绪元年七月十三日。

⑨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78—186 页。